

# 农村养老实践类型差异分析\*

甘颖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武汉 430072)

**摘要:** 本文通过对中国6个地区农村的实地调研发现,农民与市场关系差异是解释农村养老类型出现分化的重要变量。由于社会结构和经济水平的差异,不同地区的农民有着不同的市场化动力和能力,前者导致农民在就业地区选择上存在差异,后者导致农民在就业领域选择上存在差异,其结果是在中国形成了本地务工、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强工弱农以及以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弱工强农等三种家庭劳动力配置形态。而养老嵌入于家庭,家庭劳动力配置方式是决定养老实践的重要因素,劳动力区域配置会影响劳动力的空间分布,从而影响老年人所获得的日常陪伴;劳动力产业配置会影响家庭经济收入,以此影响老年人所获得的经济积累。由此,在农民与市场关系影响下中国农村养老形成了高、中、低三种养老实践类型。基于此,农民与市场关系视角的提出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对中国农村养老现象的理解,充分体现了现代化转型对中国农村家庭的深远影响,也为进一步的政策干预提供了理论指导。

**关键词:** 农村养老; 农民与市场关系; 劳动力配置; 区域配置; 产业配置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思路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中国正面临的重要问题,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较2010年,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正在进一步加剧。而农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个、6.6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2021),由此,农村社会已经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战场。理论上而言,随着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农民可以通过外出务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用于赡养老人,因而全国各地农村的家庭养老水平应该得到普遍提升,但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通过对多个省份的实地调研发现,不同地区农村家庭的养老实践存在着显著的类型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不同地区的农村老年人所能获得的经

济支持和身体照料都存在显著差别。那么,农村家庭养老的类型差异到底缘何产生?这是本文的主要问题意识所在。

当前,关于农村养老实践类型的相关研究,学界主要以文化结构视角、公共服务视角来进行相关阐释。其一,文化结构视角。文化结构视角下的相关研究将农村养老的实践差异视为不同地区间文化差异的结果。贺雪峰(2009)按照农民集体行动单位的差异,将中国社会分为南、中、北三个不同的区域,其中南方农村多为内部紧密团结的“宗族型村庄”、北方农村多为派系斗争激烈的“小亲族村庄”、中部农村多为内部关联分散的“原子化村庄”,并认为不同的社会结构类型会塑造出不同的代际关系,从而导致家庭养老实践的区域差异。基于此,一些学者将三种不同类型农村社会中差异化

\* 项目来源: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村庄治理现代化的区域差异研究”(编号: 18ASH002)

的养老实践分别称之为伦理型养老、规则型养老和情感型养老(班涛,2017),其中南方地区农村普遍采取伦理型养老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养老伦理内嵌于宗族规范和伦理之中,如果出现了老人不好的现象,村庄中会存在宗族房头干预等制约手段,所以,在南方农村中基本上没有“不养老”的情况(贺雪峰等,2012);北方地区农村则普遍采取规则型养老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养老是基于规则,体现为父代对子代的强支持和子代对父代的弱回馈(陈锋,2014);中部地区的结构性不强,个体的情感性关联成为应对养老问题的主要依据,因而与父母感情交好的女儿会采取“不嫁不娶”的婚居方式来参与养老(高万芹,2018)。

其二,公共服务视角。公共服务视角下的相关研究将农村养老的实践差异视为不同地区间公共服务存在差距的结果。李俏(2016)认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该地区的就业机会和就业环境,因此,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会导致不同地区农民的就业方式和收入来源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农村养老形态的多元化。杨健等(2009)提出,中国各地方政府往往是根据当地的生产力水平和财政能力来建立养老保障体系,经济越是发达的地方,能够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就越高。王雪辉等(2020)通过对农村养老的社会服务供给进行系统性评估发现,中国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供给总体水平偏低,内部结构差异显著,在地理分布上自东向西呈阶梯状分布。其中,王晶等(2019)对上海等发达地区养老服务模式调研时发现,政府通过给社会成员购买长护险,来为有长期护理需求的老年人提供专业化、高质量的养老服务;而中西部普通农村缺乏财政支持,老人每年仅有少量的养老金,没有丰富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个体自养水平不足,需要建立“互济+代际”的养老模式,于是以家庭或者村庄自组织为基础的互助养老成为了地方重要的养老补充(郝金磊,2012;甘颖,2020)。

综上,学界已从文化结构论、公共服务论对中国农村养老地区差异形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总结,这些研究表明中国养老实践类型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非一致性的特点,其背后蕴含着很强的结构性机理。然而,以上两种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局限

性。第一,社会结构论将家庭观念作为一个封闭系统来理解养老,认为养老是一种代际关系互动的结果,“父慈子孝”和“养儿防老”的反馈型代际关系是家庭养老得以维系的基础(费孝通,1983),但却忽视了家庭策略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即城市化、打工经济等外部现代性要素对传统农村养老秩序造成很大冲击。第二,公共服务论虽然都看到了区域经济发展对农村养老的影响,但也忽视了养老不仅受外部要素的影响而且还嵌入于家庭之中,家庭结构是影响养老的重要变量,因而家庭资源是影响家庭养老的关键,资源禀赋越强的地区,老人所获得的经济支持越丰富;而经济资源越紧缺的地区,资源被分流给子代,家庭养老的功能越发弱化(张曦,2019)。基于此,本研究结合以上两种观点,旨在探索兼容家庭和外部因素相结合的视角,而农民与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恰好印证了家庭在现代性要素的影响下,试图通过经济资源和人口结构等策略性配置来适应外部因素对农村家庭养老秩序的冲击。

农民与市场关系是理解农民家庭、个体行为的关键变量。传统时期人口的非流动性使得家庭再生产是依附于土地来实现的,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等现代性要素对农村的渗透,农村劳动力得以高度嵌入于市场之中,“土地去过密化”成为农民新生产方式选择,这也引发了家庭劳动力配置的新变化。但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却没有走向社会化,其依旧需要通过家庭成员的赡养来实现,因此,家庭劳动力配置与家庭养老状况密不可分。家庭养老既包含对老人的经济支持,又包括对老人日常生活的照料与陪伴(穆光宗,1999),家庭的经济积累能力和陪伴老人的时间成本是实现养老保障的根本。家庭劳动力配置作为农民市场化的体现,其受劳动力市场化能力和动力的影响可以分为劳动力区域配置与产业配置两个部分,劳动力区域配置和产业配置的差异化分布会造成劳动力空间分布和经济收入的差异,进而影响老年人所获得的日常陪伴和经济积累状况,以此形成不同区域的农村家庭养老实践类型。基于此,以农民的市场化能力和市场化动力作为划分标准,可以将农民与市场关系分为三

种不同的市场类型<sup>\*</sup>,即中心市场:市场化能力强、市场化动力强;半中心市场:市场化能力弱、市场化动力强;弱中心市场:市场化能力弱、市场化动力弱。其中,中心市场区域总体养老水平较高,尤以浙江绍兴、江苏苏州等地为典型区域<sup>\*\*</sup>;半中心市场区域养老水平较低,尤以山东菏泽、河南驻马店等地为典型区域;弱中心市场区域养老水平一般,尤以云南楚雄、贵州遵义等地为典型区域。

在农民与市场关系的分析框架中,不同地区农民与市场关系存在非一致性,劳动力区域配置和产业配置的差异化分布造成劳动力空间分布和收入不同,从而生产出不同的家庭生计形态。家庭劳动力配置作为一种家庭生计模式的体现,不仅是一种生产经营方式,还是一种家庭互动形态的体现,既涉及人口结构下的家庭分工,也包含经济结构下的收入分配(杨华,2015)。而劳动力配置并非简单理解为劳动力要素的自发流动,而是受到家庭、村庄和市场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不仅受限于劳动力产业配置的市场逻辑,还嵌入于劳动力区域配置的社会逻辑。基于此,本文认为家庭劳动力配置可以分为劳动力的区域配置和产业配置,前者受劳动力市场能力的限制,后者受劳动力市场化动力的限制。其中,劳动力区域配置指的是劳动力是本地就业或异地就业,其本质是农民作为劳动力要素的属性进入市场所能接触到的务工机会,地方工业化发展水平越高,越能够全面吸纳劳动力到本地市场务工。产业配置指的是劳动力的生产方式究竟

是务工还是务农;是全部务工或是完全外出务工还是部分外出务工,其内核是农民作为个体和社会人的文化、价值属性所产生的市场化意愿,虽然城市化导致了农民从乡村向城市的流动,但在此过程中农民的市场化也并非完全理性的行为,其行为意义还需要在村庄中来理解与定位(卢青,2020)。家庭发展能力越强的地区,其嵌入劳动力市场的程度越高。由此,可以认为农民与市场关系也是具体的,农民的市场化能力与动力共同影响农民的务工地点、务工类型、务工数量、务工时长和务工收入,从而影响农民家庭劳动力配置。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以农民家庭作为分析单位,将农民市场融入作为分析视角,基于农民市场化能力和动力两个维度类型化出农民与市场关系的区域类型,并通过分析农村家庭劳动力区域配置和产业配置的情况来探究农村养老在不同农民与市场区域类型下的基本形态与实践类型。其中,经济积累针对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日常陪伴照料针对半自理能力和无自理能力的老年人(见图1)。文章的创新点在于:第一,通过农民与市场关系的视角来扩展学界对于农民家庭养老的相关理论视野;第二,通过对农民市场化动力与市场化能力来进行相应的区域类型建构,以丰富农村养老的实践类型。文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其经验材料主要来源于笔者从2017年起在中国6个村庄的田野调研<sup>\*\*\*</sup>,文章基于多次、多点调研而形成了对于农村家庭养老问题的集中思考。

## 二、中心市场:本地务工背景下的高水平养老

(一)强市场化动力:城市生活预期、阶层竞争与务工就业

家庭发展能力是家庭策略的产物,是家庭能动性的体现(李永萍,2022),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结构的产物,具体受家庭发展目标以及村庄环境等两

方面影响。一方面,城市化的家庭发展催生了农民的强家庭发展意愿。与中西部地区不同之处在于,位于中心市场的发达地区农村依托于明显的区位优势,其作为人口流入地,子代家庭再生产的压力并不大,但是该地区农民仍然具有较强的家庭发展

\* 按照正常的市场化能力和市场化动力作为划分标准,可以将其分为四种不同的农民与市场关系类型,但是市场化能力强、市场化动力弱这一类型主要以珠三角地区最为典型,但当地农民受地租经济的影响,嵌入劳动力市场的程度并不高,而地租经济不符合上文对农民市场化概念界定。因此,这一类型不在本文理想类型的讨论框架内

\*\* 所谓的典型地区并非适用于全国每个地区,而是作为一个区域内的典型代表适用于该区域内的大部分地区,比如江苏的宿迁虽然在区位上属于中心市场区域,但是从社会因素与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来看,不符合该区域的一般特征,所以本文仅讨论的是典型区域

\*\*\* 笔者随团队于2017年起在浙江绍兴X村、江苏苏州G村、河南驻马店D村、山东菏泽S村、贵州铜仁T村以及云南楚雄X村等地进行实地调研,共计110天。并且,根据学术研究的要求,文中地名、人名已做相应处理

动力,这一动力来源于其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由于受城市辐射的影响,社会成员对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有较多需求,在浙江绍兴,买房进城获取好的教育资源成为农民家庭发展的核心目标。而当教育成为实现农民阶层流动的一种手段时,就需要较强的经济实力来实现家庭发展目标。于是,在当地不仅青壮年劳动力努力进入市场,连70岁的老人也还在打零工为进城买房而准备着。另一方面,村庄内部的阶层竞争激发了社会成员的市场化意愿。

在阶层分化的影响下农民需要凭借经济地位来实现对其社会声望地位的确认,车、房、酒席档次就成为他们面子的评价标准。因此,该地区农民需要有较强的家庭再生产能力才能确保在村庄面子竞争中不被拉下,从而引导农民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于市场中,其进入市场的频率和强度都比较大。可见,在阶层流动和阶层竞争的驱使下农民有着强烈的生活预期,从而引导他们进入市场赚取更多的经济资源用于实现这一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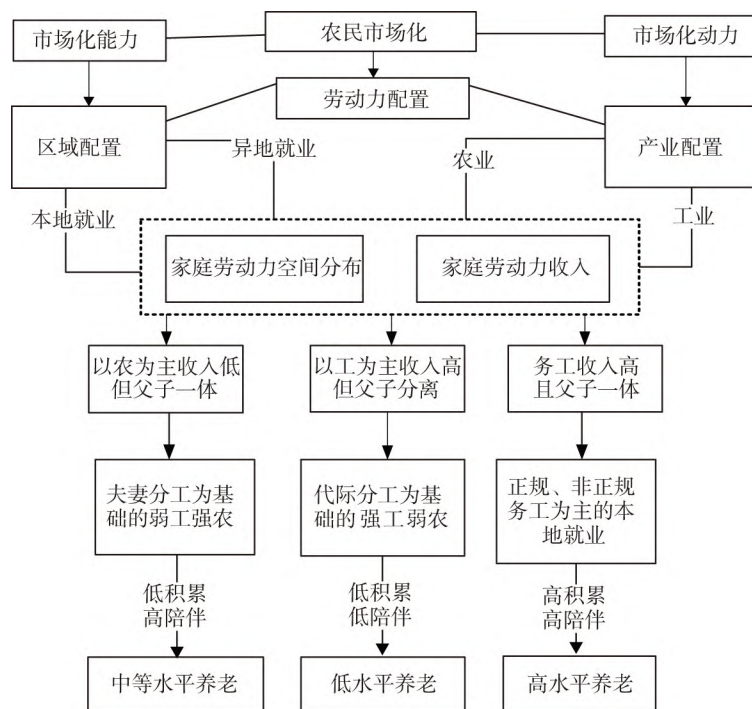


图1 农民市场化下农村家庭养老的实践类型

(二) 强市场化能力: 先发工业化优势与本地正规与非正规就业

中心市场区域最大的特点在于就地工业化为本地区劳动力创造了“离土不离乡”的市场化条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口导向型经济使得城市和沿海经济带具有先发优势,能够承接起上海对外贸易订单和产业转移,像苏州这样的沿海城市凭借已有的供销系统与大型国企合作成功占据卖方市场,以此吸引了农民大规模进入乡办企业或者村办企业工作。这一工业化浪潮也随之引发了农业生产的“没落”相比于收入较低且辛苦的务农,务工收入不仅收入较高、耗费的精力还小,这就使得土

地在80年代末就被反租倒包给外地人种蔬菜。直至今日,伴随着工业园区的建立和外来人口的流入,本地农民能自由选择地从传统到现代,从正规到非正规,从高薪到低薪的全品类工作岗位。一般而言,年轻人会进入工厂、企业或者机关单位从事正规就业;而中老年人因为受年龄和学历的限制,在初级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不如年轻人,因而他们大多从事如保安、工厂门卫等非正规就业。60多岁的老人可以从事保洁、环卫等日常服务管理工作;70多岁的老人可以经营流动餐车、摆地摊等零售业;甚至80岁的老人还承担送牛奶、打扫卫生等简单的服务工作。有些勤快的老人一天下来可以

干三份活。本地市场较好地解决了家庭中剩余劳动力生计问题,赋予了农民较强的参与务工能力。

(三)本地务工就业下的强经济积累和强日常陪伴

中心市场区域以正规、非正规务工为主的本地就业意味着两代人同时投入本地劳动力市场参与务工就业,父子生活在同一空间内,因而老人可以获得在经济积累和日常陪伴获得高水平的满足,呈现出双强日常陪伴与经济积累的养老类型。其一,“离土不离乡”的务工环境产生了高家庭经济积累。中老年人虽然从事的是非正规就业,单一岗位的收入有限,但是其从事的岗位越多,其收入的总和越高。一般从事非正规就业的老人一年的务工时长高达300天,两个从事非正式就业老人的总收入也有3000~4000元/月。再加上子女过年过节给的一些“心意”,老人至少有10万~20万元的积蓄用于养老,丰厚的经济积累就为他们的养老提供

了物质保障。

另一方面,同一生产生活场域下成员具有强互动性。较强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可以为父子之间提供就业生活一体化的近距离生活接触。虽然儿子在城里居住,父亲在村里居住,但都在同一个空间范围内;再加上公共交通设施的完善以及私家车的普遍化,子代可以在短时间内往返于城乡之间,白天在城里工作,晚上回村吃饭。周末节假日时,子代也会主动与父母相聚,开展如短途旅行、聚餐等家庭活动,以增进彼此之间的情感。而当面对身体无法动弹的老人,子代也可以随时回家照顾,其一可以随时送医;其二还可以在下班回家后帮老人护理个人卫生、清洗衣物等。可见,同一个生产、生活场域之下的代际互动显得频繁又亲密,家庭成员的陪伴使老人能够获得较多的精神慰藉和日常关心(杨华,2019),保持身心愉悦的同时减少了心情不畅带来的精神压力。

### 三、半中心市场:强工弱农背景下的低水平养老

(一)强市场化动力:简单家庭再生产、竞争型底色与代际半工半耕

与中心市场区域以阶层发展的家庭发展动力不同的是,半中心市场区域的家庭则是以简单家庭再生产目标作为家庭发展的动力,家庭本位的伦理观念使得父代帮助子代完成家庭再生产是其不断奋斗的动力,而日益增长的婚配成本则对家庭经济能力的要求提高,于是,在家庭伦理与个体价值实现的背景下,这一婚姻市场的标配就转移到了父代身上,父代只能通过不断剥削自己来实现其人生意义(杜鹏等,2018)。同时,本地的竞争性结构也激活了社会成员的务工激情。从生产到生活、从衣食住行到婚姻成本都能作为村庄竞争的标的,因而他们只有从市场上积累更多的资源,才可能在村庄实现全方位的“取胜”,这一竞争性的村庄底色就“逼迫”社会成员全方面地投入市场中,家庭中至少有3个劳动力处于市场中才能确保家庭经济积累达到最大化,整个家庭在社会压力与家庭简单再生产压力的共同引导下,形成了强大的代际合力。年轻人外出务工时尽可能地减少休息时间;中老年女性在家管理田地和抚养孙代;中老年男性靠打零工和一亩三分地自种粮获得少部分的经济积累,以此通

过市场层级格局作为代际合力积极融入子代家庭的城市化目标之中(刘向东,2021)。在河南驻马店D村,一个家庭的毛收入大约能达到8万~10万元/年。

(二)弱市场化能力:工业化发展滞后与跨区域异地就业

与中心市场发达区域较为丰富的经济发展机会和务工岗位相比,中西部地区的就业机会有限,一方面,乡镇企业改制,乡镇企业“散小乱污”的弊病使得一部分企业在改制过程中被市场淘汰,以至于部分农民从第二产业又回归第一产业;另一方面,地方工业化发展缓慢,县域内工业占比低,难以通过工业化的方式吸纳农民就业(贺雪峰,2019)。比如河南S县就缺少第二、三产业发展的机会,县城和乡镇的工业体量有限,几个小型的小作坊难以满足本地农民的务工需求,因此,农民大多只能从事农业生产而无法进入工厂就业。随着中国正式加入WTO,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出现急需引入大量劳动力以缓解市场供需矛盾(谢玲红,2021),同时,沿海地区的城市建设和开发也需要大量的农民工参与。在此背景下,国家进行了城乡二元体制改革,2000年以后国家逐步实现了城乡劳

动力市场一体化,这就为农民外出转移就业提供了契机。至此,全国劳动力市场建立,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可以通过异地就业的方式来实现基本的生产。比如河南的农民依托于较近的物理距离,更青睐于进入长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带务工,他们因为没有太多的技能,一般都会选择进厂或者从事重体力活。然而,异地务工却需要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额外承担吃穿住行等多项生活的费用,当农民在城市务工所得与城市高额的生活成本存在张力时,退回村庄从事农业生产就成为中老年农民家庭的最佳选择。于是,大部分中西部农村的中老年群体会选择在50岁后退回村庄从事农业生产。

(三)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强工弱农下的强经济积累和弱日常陪伴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是当前农民家庭最为普遍的一种家计模式形态(刘升,2015),父代的经济来源有限且子代外出务工,他们无法为父代提供相应的日常陪伴和照顾,因此,老人所能获得的经济积累和日常陪伴只能得到较低水平的满足,由此呈现出双弱经济积累与日常陪伴的养老形态,其养老水平较差。一方面,老年人获得较少的家庭经济积累。在文化结构的引导下,年轻夫妻外出务工只有过年时才回家;年长的父母在本地务农,并负责抚育孙代。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老人而言,一般会种植一亩多小麦套播花生、土豆再加上半亩的菜园来维持自给自足,有些身体还算硬朗的老年男性还会选择到附近乡镇或者村庄从事简单的和水泥、打药等零散就业,平均下来可以获得大约有1万~2万元/年的收入。虽然家庭的整体收入较高,但是家庭内部的开支也不小,尤其是孙代结婚的所需要支付的婚姻成本较高,在河南安阳,结婚的成本高达60万~80万元,结婚不仅要在城里买房,还要支付20万元彩礼。于是,家庭需要

为子代成家支付的成本远远高于其获得的收入,愿往下流的资源传递只能让老人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老人能够获得的家庭经济积累有限,日子过得极为朴素。在山东S村调研时发现,当地老人平时很少吃肉,只有过年才会吃肉,衣服也穿了很长时间,都打了好多补丁还没换新,原因是子女赚钱不容易,不要他们买的鞋子、衣服。

另一方面,异地就业产生的完全生产、生活分离导致其互动性弱。半中心市场区域的家庭成员具有充分进入市场的动机,壮年农民倾向于完全投入市场赚取经济来源;而中老年父代在城市高生活成本的挤压下回到村中从事农业生产,这就造成了父子之间长期的代际分离。而父子之间跨区域就业和生活就使得他们平时只能通过网络进行联系,而子女的通讯联系并未明显改善老年父母精神健康,他们更需要子女提供面对面的情感关怀和生活上的照料来缓解了可能产生的心理问题(张驰等,2022)。同时,在生活照料上老人的情况也并不乐观。如果是能自理的老人还能自我照顾;如果是半自理或者失能老人,有老伴的还能依靠老伴照顾,如果老伴过世就只能寄托在孩子身上。然而,子代虽然有心照顾但无奈家庭发展压力太大,外出务工赚钱和回家照顾父母存在较大的张力,因而即使有的老人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子女也选择不回家照顾,这导致一些高龄、丧偶老人的失能、半失能老人养老状况难以得到保障。河南驻马店D村的一位87岁的高龄独居老人生活基本无法自理,儿子们都在浙江打工,不仅无人帮忙洗澡维持基本卫生,天气冷了也没有衣服穿,2013年雪灾时在家被冻死了好几天才被邻居发现。而有的老人甚至为了不让子女担心,生病也熬着不告诉子女,甚至还自认为是家庭的累赘。

#### 四、弱中心市场:弱工强农与中等水平养老

(一) 弱市场化动力:个体化发展、紧密型社会关系与夫妻式半工半耕

然而,并非所有的中西部农村都是强发展导向的,对于西南山区“原子化”地区的农民而言,其整个家庭的发展呈现出较为弹性和松散的特点。首先,家庭没有很明确的家庭发展目标,其更多的是个

体化目标,即活在当下、享受生活,进入市场也只是为了更好地享受生活。在浙江调研时发现,云贵的农民工生活得很随性,不仅不会加班,还要利用有限的假期去玩耍,“打工不用太辛苦,钱够花就行了!”可见,农民务工是服务于自身需求而非子代责任,父代的市场参与动力不足,无压力的家庭再



生产就稀释了农民市场化的压力。

其次,村落共同体内部的系统整合也会降低农民的市场化观念与行为。比如云贵山区依托于物理空间而发育出村庄内部较为密切的社会关系,因而村庄内人情、劳动互助等关系维持型活动村民必须要参加,这种自发的互助秩序就限制了农民的频繁外出(贺海波,2018)。在贵州,年轻男性平均每年都因为湾子里的事情返乡4~5次,他们一般从事非正式且灵活的建筑行业以便于随时回家。而女性则作为留守在家的成员代替小家庭参与各种村庄内部的日常交往,她们留守在村庄主要从事一些基础的农业生产。可见,该地区家庭劳动力参与市场的数量较少,基本只有一个壮年男性劳动力参与市场,且壮年劳动力的时间投入也有限,因为灵活的非正式就业时长受天气、季节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因而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经济收入。

(二)弱市场化能力:山区交通阻碍、工业化发展滞后与跨区域异地就业

与中心市场区域的中原腹地不同,弱中心市场区域主要分布在西南山区的典型地带,隶属于乌蒙山区和武陵山区这两个连片特困地带,该地区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80%以上,较差的交通条件就影响了农民的市场化能力。在一些云南山区的农村,从村庄到县城需要近一天的车程,并且道路曲折且不平坦,在天气不稳定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滑坡、泥石流等情况,严重阻碍了农民的出行。所以即便全国劳动力市场已经建立,但是农民受出行交通的影响只能在山地上种植烟草和茶叶等对自然条件要求不高的作物。直到2010年国家加大力度对山区农村进行基础设施改造,当地的交通等基础设施才得到很大的改善;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让很多山区农村在2017年左右实现了村村通、组组通,交通条件因此得到彻底的改善,公共交通的逐步完善使得农民具备了务工的可能。但是,中西部地区普遍存在工业化发展滞后的问题,地方工业化发展能力有限只能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吸引企业入驻,而交通成为了招商的关键变量,基础设施的便利程度会影响商贸发展程度。所以,虽然同为中西部地区,但是西南山区相较于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更为缓慢,农民想要来城里打工大多会从事一些装修、

建材等非正规就业。由此,农民想要务工就只能前往发达地区,很多云贵地区的农民工通过传帮带的方式来到浙江或者珠三角地区务工,他们要么选择到工厂里工作,一天工作10个小时;要么是靠手艺“吃饭”。像贵州很多村庄都是“专业村”,调研的T村主要从事的是木匠活;隔壁B村主要从事的是泥瓦活,基本上一个村一个手艺。农民也从在本地务农向异地务工的生产方式转变。

(三)以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弱工强农下的弱经济积累和强日常陪伴

对于弱中心市场以农为主,务工为辅的夫妻分工家庭劳动力配置,可以让老人获得的经济积累和日常陪伴得到一般程度的满足,呈现出弱经济积累与强日常陪伴的中等水平养老形态,其养老水平介于以上两者之间。其一,老人拥有适度的经济积累。该地区老人本身能够获取经济收入的来源较少,仅靠新农保和简单的农业生产以勉强维持日常开销。老人们一般会耕种一亩三分地,养一头猪,再养几只鸡,基本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再加上国家发放每月100元的新农保,就可以维持一年的伙食支出。但是老年人的开支并不大,相对平缓的代际关系以及子代的家庭再生产成本不高就极大确保老人拥有适量的物质资源。除此之外,子女也会提供少许物质反馈,基于血缘的亲情互动让子代具有很强的赡养意愿,在没有强烈人生任务的驱动下,子代对父代的付出就显得更为水到渠成并转化为基础性的衣食住行用。一般过年的时候女儿会给老人买新衣服,平时家里需要购置家电、家具的时候,儿子和儿媳也会直接在网上帮老人购买,子代的主动反馈可以较好地满足老人的低生活需求,因此老人自养与子代反馈产生的两份经济积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养老质量。

其二,子代与父代的弱代际分离增加了代际之间的互动性。虽然年轻男性在外务工,但周期却不长,一些男性甚至为了保持家庭完整性而选择在本地务工,零碎性的外出务工增加了年轻男性在家陪伴老人的时长。而年轻女性在家务工就可以为老年人提供一系列的照顾。一方面,对于还有自理能力的老人而言,儿媳在节假日也会带着孩子到老人家里串门,过来陪老人看电视,同时帮他们购买日常用品、打扫一下卫生。另一方面,对于身体不

便的失能与半失能老人而言,子代不仅会在病床前照顾老人,而且还会为其提供做饭、买药、洗衣、洗澡等日常起居照料。“有人在家”就让老人的日常陪伴可以在家庭内部被消化,父代与子代之间并非完全的空间分离。一方面,儿媳妇承担了照顾父母的角色;另一方面,儿子也会时常往返家中陪伴父母,这就让父代与子代之间产生较为频繁的日常交往与互动,从而使得老人减少由于孤独、苦闷而造成的不良情绪。比如云南雄楚 X 村廖某,家中有一儿一母需要照顾,尤其是家中 70 多岁的母

亲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病还半瘫痪在床,所以他就在县城打零工,媳妇在家照顾母亲和儿子,以防母亲有突发情况还能有个照应。

综上所述,不同农民与市场关系下会形成不同的家庭劳动力配置形态,从而影响了家庭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和劳动力收入,进而影响老人所能获得的经济支持与日常陪伴。可以认为,基于不同市场化动力和市场化能力的双重互动,农村家庭养老会呈现出不同的实践类型。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农民、市场关系与农村养老类型比较

比较维度	中心市场	半中心市场	弱中心市场
市场关系	市场化能力强、市场化动力强	市场化能力弱、市场化动力强	市场化能力弱、市场化动力弱
家庭劳动力配置	正规非正规的本地务工就业	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强工弱农	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弱工强农
养老状况	强经济积累、强日常陪伴	弱经济积累、弱日常陪伴	弱经济积累、强日常陪伴
养老类型	高水平养老	低水平养老	中等水平养老
典型区域	以江浙为典型的东部农村*	鲁豫为典型的中部农村	云贵为典型的西南农村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全国劳动力市场建立的背景下,农村家庭的家庭劳动力配置从完全依附于土地的务农向可以选择的务工转变,农民市场化成为了新的择业选择。但是,农民与市场关系并非在全国呈现出一致性,以农民与市场的市场化能力和市场化动力作为衡量标准,可以将其分为三种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关系类型,即中心市场区域、半中心市场区域以及弱中心市场区域,三种类型之下农民的劳动力产业配置和区域配置皆有差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心市场区域是以本地务工为主的劳动力配置,呈现出双强的经济积累和日常陪伴的高水平养老;弱中心市场区域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强工弱农的劳动力配置,呈现出强日常陪伴、弱经济积累的中水平养老;半中心市场区域是以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弱工强农的劳动力配置,呈现出双弱经济积累和日常陪伴的低水平养老。基于此,本文依据具体的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农村养老政策的制定需要与地方的经济

发展和社会文化背景相结合。养老实践类型差异的存在决定了建立“普适性”的农村养老模式并不现实,因而应该要区分养老水平差异化的产生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分类制定养老政策。东部典型地区在地市场化使得家庭养老并未发生错位,相反老年人还可以通过自养或者社会化养老的方式有效地解决养老需求,因而政府可以将养老的关注点落在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方面,通过建立老年大学以及文化下乡丰富老年人的日常闲暇。而相对于东部典型地区的在地市场化,中西部典型地区则呈现出异地市场化的劳动力配置,这就造成家庭养老的功能与家庭结构功能社会化的不匹配。因此,应该将养老政策的重心落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以此回应这两个区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第二,中西部地区农村的养老服务供给应着重回应老年人的日常陪伴问题。但是对于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而言,受自身生理条件以及子女务工的

\* 虽然珠三角地区属于发达地区农村,但不再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影响其日常陪伴的需求无法及时获得满足,因而需要依靠外力加以保障。而村社、政府作为养老服务的重要供给主体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其一,政府要完善既有的养老保障体系。长护险制度作为照料服务的探索能够覆盖多数失能老人群体,因而要确保长护险能够真正发挥作用,这就需要政府在推广长护险的同时做好相应的服务评估工作。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公建民营、扩大福利院服务范围等方式为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提供去处,既能确保有照料需求的老人获得基本的生存保障,又能让他们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照料,减轻家庭的负担。

第三,通过村社互助养老的运作为他们提供照料服务。村庄中还存在着老党员、老教师、老干部等有闲有组织能力的群体,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政策倡导并挖掘村庄内生的人力资源为留守且有需要的老人提供送餐、个人护理等基础性日常生活照料服务。同时,地方政府可以划拨一部分民政资金用于补贴参与护理的人员以及相关照护服务的日常运转,以低成本、高福利化解失能家庭所存在的养老危机。

第四,重构老年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受外出务

工和城镇化的影响,代际之间的空间分离会为增加老年人的精神孤独,但是家庭交往的弱化并不意味着村庄交往的萎缩。村社集体可以引导和组建老年人协会、老年志愿服务队等自组织,通过上门聊天、过寿送祝福等方式让他们在关爱中增加幸福感、减少孤独感,以组织化互动的方式增加老年人之间的社会性关联,在相互陪伴获得情感关照。

第五,注重集体土地制度的保障性功能。中西部地区的养老服务供给虽然重点落在对失能与半失能老年人的日常陪伴上,但是对能够自理且具备劳动能力的老年人而言,土地对他们具有生存意义与价值意义,因此,发挥土地的保障性功能也对农村养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此,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发挥农村土地制度的养老优势:其一,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政府可以通过土地整治来实现土地连片经营,采用机械化作业为小农提供便利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他们自给自足生产、生活的效率。其二,谨慎推行资本下乡政策。政府制定土地政策的时候要从人地关系的长远利益出发调控农村的土地流转,确保土地与小农经营相结合,为老人留下足够的生产生存空间。

##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5/t20210510\\_1817181.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5/t20210510_1817181.html)
2. 贺雪峰. 农村代际关系论: 兼论代际关系的价值基础. 社会科学研究, 2009(5): 84~92
3. 班涛. 农村养老的区域差异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 2017(5): 142~149
4. 贺雪峰, 郭俊霞. 试论农村代际关系的四个维度. 社会科学, 2012(7): 69~78
5. 陈锋. 农村“代际剥削”的路径与机制.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2): 49~58
6. 高万芹. 双系并重下农村代际关系的演变与重构——基于农村“两头走”婚居习俗的调查. 中国青年研究, 2018(2): 11~17
7. 李俏, 朱琳. 农村养老方式的区域差异与观念嬗变.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2): 93~102
8. 杨健, 张金峰. 中国农村养老模式区域分异研究. 兰州学刊, 2009(2): 144~147
9. 王雪辉, 彭聪. 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供给水平研究.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1): 117~128
10. 王晶, 李鹏飞. 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模式的优势与思考——基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养老服务现状的考察.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9(6): 133~139
11. 郝金磊. 区域差异背景下农村养老模式的构建. 广西社会科学, 2012(12): 100~104
12. 甘颖. 农村养老与养老自组织发展.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2020(3): 48~58
13. 费孝通. 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3(3): 7~16
14. 张曦. 转型期实践性养老秩序形塑机制研究——基于家庭与市场关系视角. 兰州学刊, 2019(11): 167~178
15. 穆光宗. 我国农村家庭养老问题的理论分析. 社会科学, 1999(12): 50~54
16. 杨华. 中国农村的“半工半耕”结构. 农业经济问题, 2015(9): 19~32
17. 卢青青. 家庭自主性与农民城市化的实践类型. 农业经济问题, 2020(10): 135~144
18. 李永萍. 家庭发展能力: 理解农民家庭转型的一个视角. 社会科学, 2022(1): 94~107
19. 杨华. 资源配置、代际责任与农村养老的区域差异.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4): 85~95
20. 杜鹏, 李永萍. 新三代家庭: 农民家庭的市场嵌入与转型路径——兼论中国农村的发展型结构.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2018

(1):56~67

21. 刘向东. 梯度养老: 渐进城市化中的农民养老模式及农地角色分析——一项基于嵌入理论视角的田野研究. 农业经济问题, 2021(1): 82~94
22. 贺雪峰. 三大全国性市场与乡村秩序. 贵州社会科学, 2019(11): 38~43
23. 谢玲红. “十四五”时期农村劳动力就业: 形势展望、结构预测和对策思路. 农业经济问题, 2021(3): 28~39
24. 刘 升. 家庭结构视角下的“半工半耕”及其功能. 北京社会科学, 2015(3): 75~81
25. 张 驰, 施海波, 张崇尚, 吕开宇. 农村外出子女通讯联系能改善父母心理健康吗. 农业技术经济, 2022(1): 97~113
26. 贺海波. 贫困文化与精准扶贫的一种实践困境——基于贵州望谟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村寨的实证调查. 社会科学, 2018(1): 75~88

## Rural Old-age Care Practice Difference and Policy Suggestion

GAN Ying

**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old-age care practice differences in rural families in China. How to understand this difference is the problem consciousness of this study. According to the field survey of rural areas in six regions, it is found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ers and the market is an important variable to expla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old-age care types. Due to the difference in so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level, farmers in different regions have different market motivations and market abilities. The former leads to differences in farmers' choice of employment areas; The latter leads to differences in farmers' choice of employment fields. As a result, three kinds of family labor force allocation forms have been formed in China, such as local workers, strong workers, and weak farmers based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weak workers and strong farmers based on the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husbands and wives. Old-age care is ingrained in the family, and how the family allocates its work force is a key determinant of old-age care practice. The regional allocation of labor will affec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bor force, thus affecting the daily companionship of the elderly; the labor industrial allocation will affect family economic income and economic accumulation of the elderly.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high, moderate, and low old-age care practices are thus developed in China as a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armers and the market. Based on thi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ers and the market helps to further enrich the understanding of pension phenomenon in China, and fully reflects the far-reaching impact of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n China's rural families, it also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further policy intervention.

**Keywords:** Rural old-age car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ers and market; Labor allocation; Regional allocation; Industrial allocation

责任编辑: 段艳艳